

刘诗白选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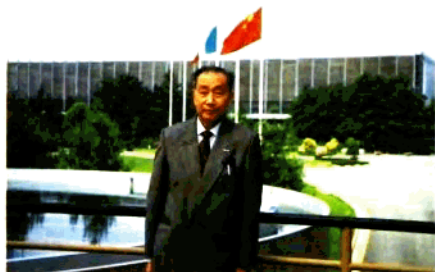
云南出版集团



作者近影



1955年在美国哈佛大学



1992年在意大利都灵

教内这里谈到的产权，即 property rights，是出于现代经济学和法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如果予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解释，广义意义上的产权，既包括财产所有权又包括财产支配权或经营权。教内所说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是一个产权主体，就是指生产或企业拥有财产所有权或支配权。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或运行方式，它是不断（经济）发展和变革的，包括微观组织结构——生产组织、经营组织结构，产权结构——的发展要革新和创新，这些变革和创新，使企业越来越适应于更加发展和成熟的市场经济的要求。

作者手迹

小 传^①

3 0105 1768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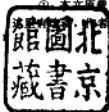
一、生平

刘诗白，1925年生于四川省重庆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位崇尚民主的爱国知识分子，母亲工于诗词歌赋。在父母的熏陶下，刘诗白从少年起就热爱文学和社会科学。他的中学时代，正值八年抗战时期，目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暴行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他立下振兴中华的志愿，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学、哲学、经济学方面的进步书刊。那时，他的书桌上已经堆放着《大众哲学》、《反杜林论》和《资本论》等著作。

1942年，刘诗白到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经济系读书。在此期间，他参加了由中共南方局领导的进步学生组织“文复社”，并曾担任过该社的召集人，积极投身学校中的进步学生活动。在大学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选修了进步教授彭迪先、杨东等的课程，他们对革命理论的宣传和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抨击，给刘诗白以极大的启发和影响。

1946年，刘诗白大学毕业，被四川大学经济系系主任彭迪先聘为助教。这时，他已经开始从事经济理论的研究工作。1947年，

① 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原题为《刘诗白经济思想评述》，作者为陈建勇。



C

417368

他翻译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多布 (M·Dobb) 所著《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一书, 多布曾为该书写了序言。他积极参加进步的青年运动, 是四川大学进步团体“文学笔会”的成员。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 蒋家王朝末日即将来临之际, 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力量加紧进行镇压, 成都面临着一片白色恐怖。刘诗白不畏强暴在 1949 年春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 发起并组织地下进步团体“职业青年联谊会”, 进行争取民主和迎接解放的革命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 刘诗白留在川大、四川财经学院等校长期讲授政治经济学、外国经济史、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等课程。1962 年, 提升为副教授。刘诗白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1958 年以前, 研究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 撰写《原子能利用上的两条路线》、《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及其危机》等专著。1958 年以后, 他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经常在报刊上发表针对现实问题的科学论文。由于科研成果显著, 1964 年他以中青年理论工作者身份, 被邀请出席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扩大会议。

“文化大革命”初期, 刘诗白遭受“四人帮”的迫害, 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 多年来从事教学和科研的讲稿、笔记、论文手稿和珍藏的书籍被洗劫一空。刘诗白在逆境中仍然坚信马克思主义必胜。虽然历经折磨, 但他并不气馁, 依然坚持经济学的研究。

1977 年, 刘诗白被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参加许涤新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的编写工作。1979 年下半年回到四川财经学院担任政治经济学系主任。

80 年代, 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 社会主义经济不断高涨的新时代, 对刘诗白来说, 这也是他一生新的转折点。1980 年 2 月, 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第二年 3 月被晋升为教授, 同年 5 月又被任命为四川财经学院副院长。1984 年, 刘诗白被批准为政治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导师。1985 年 2 月, 他被任命为四川

财经学院院长，同时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任为学术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经济学分组）成员。1985—1991年2月任西南财经大学校长，现任西南财经大学名誉校长，四川省社联副主席，经济理论刊物《经济学家》杂志社主编。在从事繁忙的教学行政工作和学术活动的同时，刘诗白还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曾任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现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四川省政协副主席。

由于近年来工作繁忙，他进行科学研究的时间少了，但他的科学研究不仅没有中断，反而成果日益丰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写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若干问题研究》、《社会主义所有制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新探》、《社会主义经济学原理》、《产权新论》、《论体制创新》等专著，出版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论社会主义所有制》论文集，主编了《国有经营性资产的经营方式和管理体制》。1978年以来，他先后在《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学术月刊》等报刊上发表了论文近150篇。在这些专著和论文中，刘诗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后出现的新事物进行了探讨并给予新的理论论证。他所研究的领域包括：不发达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作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家庭联产承包经济，社会主义企业及其活力，社会主义股份制，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等等。在上述领域的理论经济研究中，他提出了不少在经济学界有影响的、独创性的见解。他在一篇文章中，概括了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界理论研究的特点：“近年来的经济理论研究，不仅具有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特点，而且具有结合新情况，提炼新理论的特点。不少的论著讨论了新情况，提出了新问题，而且也初步作出了一些新的论述和运用了新的方法。我国经济理论活动已经开始出现了把对马列主义的坚持和创新相结合的新风。这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理

论能履行时代赋予的职责，真正成为指导改革理论的关键。”这一段话可以说是他自己近十多年来理论研究的写照。

刘诗白不仅在理论经济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同时，他还是一位忠诚的教育工作者。近五十年来，他一直从事高等教育工作，坚守在教学第一线，担任大学行政领导工作后，他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专题的讲授和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

刘诗白还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1984年，他赴美国考察，访问了美国10所大学；1987年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大学、堪培拉大学和新西兰的维卡托大学讲学，1988年应邀到美国哈佛大学、西北大学、田纳西大学、玛里塔学院及加拿大圣玛丽学院等讲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受到国外经济学家的好评。刘诗白数十年卓有成效的科学研究、教学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使他在国际上享有一定声誉。目前，他已被列入美国传记研究所编的《国际名人录》（1988年第2版）、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编的《国际领袖人物录》（1988年版）、《澳洲、亚洲、远东名人录》（1988年第1版）等传记之中。

二、主要学术观点

（一）提倡政治经济学要拓宽研究范围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国内外经济学界长期存在争论，刘诗白对这个问题的独到见解，引起了经济理论界的广泛重视。

1. 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的区分

早在50年代，刘诗白就倡导拓宽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他的基本观点是：为了适应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政治经济学必须拓宽研究范围，并提出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

是两个不同的范畴^①。他认为,科学的对象是科学所要探究其规律的客观存在的特定领域;由于客观事物的区别,决定了各个学科的对象的区别性。但是,客观事物之间所具有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性质,决定了科学的研究过程不仅要探索属于其对象的特定领域的规律性,而且还要对某些不属于其对象范围,但与研究对象有密切联系的事物加以考察。因此,研究范围总是大于对象范围。根据以上逻辑推论,刘诗白在肯定社会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对象的同时,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中应该包括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而不能像传统研究方法那样只研究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这个观点,在当时就引起了国内外理论界的关注。

2.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重视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

刘诗白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需要把研究的范围拓宽,即要把生产力发展运动的规律和经济运行机制纳入其研究范围,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一中心目标^②。为此,就必须深刻地分析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环节的运动,要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具体经济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总结,以指导经济活动的实践,不能把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和内容只限于几条抽象的“规律”。

刘诗白指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包括宏观、微观和中观的经济运行机制。宏观的经济运行机制是从国民经济总体上来研究社会再生产和各种经济活动;微观的经济运行机制是从企业的角度来研究生产、分配、交换等经济活动;中观的经济运行机制

① 参见刘诗白《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经济研究》1961年第10期。

② 参见刘诗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经济科学》1986年第2期。

是从一个城市、一个部门的角度来研究经济活动。他认为,只有通过对经济运行机制的全方位的分析与研究,才能更好地揭示社会主义经济的现实运动及其规律,从而更好地指导与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3. 强调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运用数量分析方法

基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运行机制的任务,刘诗白十分重视并强调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加强数量分析^①。他认为,要研究经济运行必然涉及具体的经济数量关系,如需求量、供给量、货币发行量、投资量、工资量等等。因而,通过数量分析,才能阐明经济活动与经济过程之间量的关系,使人们可以从复杂的经济现象中分离出若干独立变量,找出各种变量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区分出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制定各种经济平衡方程式,建立起各种数学模型,从而利用它们来进行经济预测,制定经济计划。为此,他主张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建立在对经济过程精确的数量分析与计量的基础之上,否则就难以避免决策失误和“瞎指挥”。他的这一见解,立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分析经济运行机制这一新的任务,同时也符合当代理论经济学研究的一般趋势。这对于丰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4. 提出人民财富的理论

基于政治经济学必须拓宽研究范围的认识,刘诗白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应是人民财富学^②。在他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原论》一书中,实际上把对“人民财富”的研究作为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这一构架的新颖独特之处在于:把人民

^① 参见刘诗白《经济科学必须加强数量分析》,《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6期。

^② 参见刘诗白主编《社会主义经济学原论》,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与物质富裕》,《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4期。

财富的最大增值、合理分配与优化使用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容;把人民财富上升为一种理论形态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归纳和科学概括。他的这种人民财富观,体现了一种新观念和新思维,即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人民生活富裕化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两个主轴,以富国裕民为要旨。这也是他关于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生产力的运动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思想的进一步具体化,为革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一条重要思路。

(二) 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多维分析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研究,是刘诗白涉猎较多且颇有创新的一个领域。多年来,他发表了许多论文和专著,从不同侧面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多维的研究。

1. 对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特征的概括

长期以来,对所有制问题的研究一直是理论禁忌最多的一个领域,但刘诗白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敢于大胆探索,是我国经济学界最早的研究者之一。1978年以来,他在一系列论著中论证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一种不成熟、不完全的所有制。1981年在成都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所有制理论讨论会上,他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结构的多元性、所有制形式的多样性、公有制具体形式内部的多层次性的新颖观点,受到了理论界的高度重视,也是他分析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一个基本立足点。

刘诗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具有多元性,即作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与作为补充的各种非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将长期并存,因为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质变采取了“扬弃”的形式,即破坏了旧事物的基本结构而保存了它的某些附件,或者克服了旧事物的内在本质而保留了它的某些形式。这样,在过渡时期结束之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结构中,除了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外,作为补充的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包括

某些带有公有制因素的过渡性与中间性的所有制形式),仍将长期存在并会有较快的发展。

刘诗白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具有多样性,不赞成把社会主义公有制仅仅归结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的观点,并根据近年来我国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形式和经济联合组织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相互渗透、交叉和结合中出现的多样化现象,从理论上论证了社会主义所有制还有多种具体形式或多种的联合所有制形式,例如“全民+集体”型、“全民+集体+个体”型、“集体+集体”型等等。

刘诗白较早地指出公有制的具体形式具有多层次性。就全民所有制来说,将会产生各有特色的若干具体形式,例如,在经营形式上将会出现国有国营、国有企业经营、国有集体租赁、国有个人租赁等具体形式;在资金结构与分配结构上,将出现吸收部分职工资金和实行按股分红;吸收集体资金、社会个人资金和实行按股分红,向其他企业进行投资和按股分红等具体形式。

2. 主张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自负盈亏

刘诗白基于对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成熟性的分析,把这种所有制的特点概括为:生产资料的全民占有关系与产品的企业局部占有关系,企业活动不是体现完整的全民利益,而是体现有部分企业局部利益;企业劳动者不仅要从统一的社会基金中取得收入,还要从归企业占有与支配的企业基金中取得一部分补充收入。他指出,传统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国家所有、国家经营和国家统一分配,企业没有权、责、利的经营管理方式,其根源正是在于忽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这种不成熟性。

依据对全民所有制特点的上述认识,刘诗白较早地主张全民所有制必须实行自负盈亏。1979年,四川省在全国率先实行以扩大国营企业自主权为内容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他深入实际认真总结了实践经验,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对全民所有制企业

实行自负盈亏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理论论证。他认为,实行自负盈亏是改革我国经济管理体制、解决国有企业缺乏活力的根本途径,不仅可以通过企业对国家上缴税金实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权利,同时又通过企业独立支配自有资金和对产品的局部占有,实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成熟性要求。他还认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自负盈亏是一个有弹性的范畴,可以有初步的、较充分的、完全的区别,国家可以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形式。改革的实践证明,他的上述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3. 对家庭生产方式的新论证

鉴于长时期以来理论界对家庭生产方式的研究不够,对这种小生产的意义和作用估计不足,刘诗白在1985年发表了《试论农业家庭生产方式》一文(《经济研究》1985年第8期),从新的角度阐述了家庭生产方式的性质及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

刘诗白认为,家庭生产方式不等于家庭经济或个体经济,也并不必然就是落后的生产方式。家庭生产方式在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之下,并采取过多种不同的形式,依存于各种不同的物质技术条件,依附于不同的所有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革命为家庭生产方式注入了新的活力。刘诗白不赞成哈佛大学珀金斯教授认为家庭经济增产效果只有7年的看法,而是基于家庭生产方式在发展生产力中具有弹性的认识,强调家庭生产方式能够吸收科学技术进步的果实以增强其适应性。他根据我国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认为家庭生产方式将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体系中一个持久的组成要素,并将成为21世纪中国经济复兴的一支重要力量。

(三) 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探索

刘诗白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研究独具特色,并以其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1. 坚持用“所有制论”解释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性

刘诗白在他的一系列论著中,对解释社会主义经济商品性的各种观点,如两种公有制论、物质利益论、按劳分配论、核算工具论、社会分工论等,进行了认真而有说服力的评论,并坚持用“所有制论”解释社会主义经济商品性的根源。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性,完全可以从社会主义主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占有关系和利益关系的特点中得到说明。由于现阶段全民所有制还不成熟,这种情况决定了企业不能把它的产品无偿地让渡给对方,它在让渡自己生产的产品时,不能不考虑与计较生产中的劳动耗费能否得到补偿,不能不关心它的生产与交换活动能否给企业带来物质利益,从而决定了企业只愿意把自己的产品当作商品让出去,决定了产品的商品性质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性^①。

刘诗白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物质的生产条件成为社会公共财产,劳动不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从属于社会共同利益;劳动力使用的结果不再是直接形成归私人占有的收入,而是直接形成社会统一分配的社会基金。这一切表明,劳动已具有了社会化的性质。但是劳动的社会化水平还不高,产品还未极大丰富,并且由于劳动还存在重大差别,人们还存在囿于个人利益的市民权利的狭隘眼界,因而对社会主义劳动必须实行物质鼓励,贯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劳动者天赋的或后天形成的不同的劳动能力成为个人消费品分配中的某种特殊的占有权利。这就表明,社会主义劳动除了公益性外,还有一定程度的私益性。社会主义劳动的这一特点,要求承认企业联合劳动的质的差别,要求实行等价交换,多产多益。如果在企业的收益分配中不承认联合劳动

^① 刘诗白:《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利用市场》,《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3期。

的差别和贯彻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就不能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

2. 对商品经济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新阐述

(1) 正确地评价商品经济的历史作用

由于囿于传统观念,我国理论界在一个很长时期对发展商品经济的历史和历史作用一直未能给予正确的评价。但是,刘诗白始终坚持历史地、客观地评价商品经济的历史作用^①。这主要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商品经济促进了分工和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刘诗白指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以社会分工的存在为前提,同时,商品关系又“通过促进社会劳动分工的发展而成为促进生产社会化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杠杆”,“在发达的市场商品关系中,……促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分工与生产社会化飞速地向前发展。”

——商品经济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仍未消失。刘诗白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之所以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是因为“商品经济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中的作用,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尚未消失”,这些国家“在商品经济向更大的广度与深度发展的基础上,业已将生产专业化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从而把生产社会化提升到新的高度”。

——要充分重视商品经济的历史作用。刘诗白指出,社会主义以前的商品经济都是与阶级剥削和阶级对抗相联系的,但更重要的是,商品经济在历史上也充分发挥了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生产社会化的作用,这是“商品经济这一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的‘合理内核’”^②。

^① 关于刘诗白对商品经济历史作用的论述,可主要参见刘诗白《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若干问题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以下简称《研究》)。

^② 《研究》第96页。

(2) 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

社会主义为什么也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呢？刘诗白主要从下述几个方面做了论证：

——要发展商品经济以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刘诗白始终认为，在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商品关系仍然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分工与促进生产社会化的重要经济杠杆”；“一切摒弃商品关系而在非等价的实物交换或无偿的活动交换基础上建立普遍的社会劳动的联系的做法，都是不成功的”；“必须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关系，来促使生产社会化”^①。

——不发达社会主义更需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刘诗白认为，发展商品经济对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分外需要”。因为这些国家在经济方面还非常落后，需要城乡之间、工农之间更大规模的商品交换；需要进一步提高农业的商品率；需要通过商品关系来发展专业化协作；需要发展商品化、社会化的生活服务事业；需要通过商品关系来发展科技文卫事业；需要通过商品经济关系促进国际经济联系^②。

——中国尤其需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刘诗白强调指出，对于中国这样的“未经历完全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化，从而在许多领域还带有自给自足性质的国家来说，更要进一步发展商品关系”；“这个社会主义商品关系的发展可以说是一身二任的：一方面，它带有补课的性质，即通过它去完成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化所理应完成的推动社会分工与生产社会化的使命；另一方面，它又是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向前发展所必需的”^③。

(3) 社会主义的商品关系要向纵深发展，形成发达的商品经

① 《研究》第96、99页。

② 《研究》第99—100页。

③ 《研究》第101页。

济。

针对长期流行的“产品经济论”以及对商品关系进行限制的观点和传统认识，刘诗白较早地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使社会主义生产在更大范围表现为商品化。他指出，不能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本性上是排挤商品关系的，是束缚商品关系发展的枷锁；更不能因社会主义制度下某些方面商品关系的缩小而得出商品关系将全面缩小、不断遭到削弱和立即为产品经济所代替的结论。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身的不成熟就包含着商品生产进一步发展的广阔余地，特别是像我国这种生产力水平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扩大和深化商品货币关系，更是生产力发展的迫切要求。

3. 认为市场调节是基础性的调节机制

刘诗白在他的论著中，阐述了社会主义仍然要重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观点，强调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调节，必须立足于市场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基础之上。

(1) 发挥市场的作用是发展商品经济的关键

早在1979年，刘诗白就针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对市场问题研究的不够以及把“市场看作资本主义”的旧观念强调指出，“在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最关键的是要充分发挥和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的积极作用”^①。

对市场机制作用的重视，以及对把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计划完全对立起来的观念的批判，在刘诗白于改革初始的一些论著中就有明确的论述。例如，在1979年的一次全国性理论讨论会上，刘诗白极力主张要改革排斥市场机制作用的中央集中计划管理体制

^① 刘诗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第268页。